

香港回归与中国社会 发展逻辑

何畏 主编



船山学刊社
CHUAN SHAN XUE KAN 1997

目 录

香港回归的哲学断想.....	(1)
高举伟大旗帜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11)

第一篇 一国两制的历史辩证法

一国两制构想既是中国的又是马克思主义的	(25)
唯物辩证法在国家统一问题上的成功运用	(37)
一国两制的历史逻辑	(47)
一国两制——社会主义辩证法光辉理论与实践	(54)
一国两制是对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的继承与发展	(60)
一国两制是唯物辩证法的光辉篇章	(67)
一国两制的本质内涵	(73)
一国两制的哲学意蕴	(83)
一国两制的历史渊源	(88)
一国两制的哲学启示	(92)
一国两制的哲学思考	(98)
一国两制构想的哲学沉思.....	(103)
一国两制构想与实事求是原则.....	(107)
一国两制构想的原则性和灵活性	(117)
一国两制体现了领导决策的实践性原则.....	(121)
论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124)
一国两制构想的理论依据和理论突破.....	(130)
一国两制构想的历史辩证法理论前提.....	(133)
一国两制构想对马列统战理论的重大贡献.....	(139)

一国两制构想是运用系统方法的结晶 (145)

第二篇 香港回归的社会发展逻辑

关于香港回归精神的思考	(150)
香港回归的社会辩证法践履	(155)
一国两制和平发展	(158)
香港回归的社会心理反应及策略启示	(166)
香港回归之邓小平策略考	(172)
邓小平香港政策 50 年不变的思想内涵	(178)
改革开放与香港回归	(182)
香港回归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辩证思考	(187)
析香港文化的殖民影响及回归后的文化走向	(191)
文化传统精华与香港经济奇迹	(196)
一国两制条件下思想政治教育的思考	(201)
香港回归与中国社会发展的哲学思考	(208)
香港在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	(212)

第三篇 民族文化的哲学反思

略论湖湘文化的内涵及其主要特征	(219)
对一种“爱国主义者”评价的惊讶	(233)
毛泽东实事求是思想的形成与发展	(246)
务实与超越	(253)
从质量互变看分配悬殊与两极分化	(260)
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文化建设	(263)
社会文化实践对愚蠢唯物主义的超越	(270)

第四篇 “两制”的矛盾运动规律

对立统一规律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	(287)
---------------------------	-------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唯物辩证法	(298)
论邓小平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科学认识	(305)
邓小平的社会主义本质论	(313)
社会主义本质的体现是一个历史过程	(318)
论“两制”的统一性	(322)
论邓小平理论的基本点	(327)
论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与实现途径	(331)
亦论实践标准和生产力标准	(336)
论可持续发展观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341)
从“三个面向”看邓小平战略思想	(345)
注重研究掌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特殊规律	(349)
现代科技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作用	(355)
论把握关节点加速产业化	(359)
西方近代政治学哲学中国家学说的发展	(362)

第五篇 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及正处方法论

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矛盾范畴体系	(369)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的继承发展	(377)
现阶段人民内部矛盾新特点和解决矛盾新方式	(384)
社会转型时期的人民内部矛盾问题	(389)
唯物辩证法是“正处”的根本方法	(396)
一国两制与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402)
正确认识和处理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	(407)
论一国两制对“正处”方法论的创新	(414)
当前农村人民内部矛盾突出的原因及对策	(420)
新时期农村思想政治工作的辩证法	(426)
坚持和完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	(432)
论农村老年保障与人口控制	(441)

第六篇 两个文明辩证发展真谛

论邓小平“两手抓”的辩证法.....	(448)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战略地位认识过程回顾.....	(454)
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几个现实问题.....	(463)
精神贫穷也不是社会主义.....	(469)
论市场经济与精神文明建设的有机结合.....	(473)
精神产品的社会功能阐释.....	(478)
论强化国有企业职工主人翁意识.....	(482)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与民族地区两个文明建设.....	(489)
我国图书馆深化改革的战略思考.....	(502)
增加图书馆投入对两个文明建设的迫切性.....	(511)

第七篇 人生道德与价值观辨析

论共产主义人生观.....	(515)
交往实践与人的发展.....	(519)
论集体主义在思想建设中的主体地位.....	(524)
从道德巨变论道德.....	(531)
负面作用——一个似是而非的命题.....	(543)
论企业道德建设的经济价值.....	(548)
论邓小平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价值观.....	(553)
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新闻工作者价值观.....	(557)
思想品德教育入耳入脑问题的几点思考.....	(566)

湖南省哲学学会理事名单	(571)
后记	(572)

香港回归的哲学断想

——湖南省哲学学会名誉会长
陆魁宏教授在97哲学年会上的讲话
(根据纪录整理)

(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1984年12月9日，邓小平会见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谈话中，这位夫人称赞邓小平说：你提出的一国两制的构想在国际上很有意义。邓小平说：“如果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用毛泽东主席的话来说就是实事求是。这个构想是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下提出来的。”

我们看看历史实际和现实状况吧。香港和澳门、台湾一样，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香港是英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三个不平等条约（1842年的《南京条约》、1860年的《北京条约》和1898年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而强行割让和租占的。中国历来不承认这三个不平等条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政府多次阐明对香港问题的严正立场：解决香港问题就是中国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现祖国统一是中华民族的共同感情、共同愿望和共同意志。几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为香港和澳门、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做了大量的工作。这个历史实际和现实状况，是我们坚持“一国”，坚持实现祖国统一的根据和出发点。

还有一个重要的客观实际，就是香港长期以来实行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祖国大陆实行社会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香港与祖

国大陆之间的政治生活状况、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方式存在较大的差异。恢复对香港行使主权，实现祖国统一，怎么个统一法？如果一下子搞“一国一制”，用社会主义来统一，香港人民不会接受，英国人民也不会接受。勉强接受了，也会造成混乱局面。即使不发生武力冲突，香港也会成为一个萧条的香港，后遗症很多的香港，不是我们所希望的香港。所以，如果采用和平方式解决香港问题，就必须既考虑香港的实际情况，也要考虑到中国和英国的实际情况。就是说，我们解决问题的办法要使三方面都能接受，中国人民能够接受，英国人民能够接受，香港人民能够接受。三方面都能接受的只能是一国两制，允许香港继续实行资本主义，保留自由港和金融中心的地位，除此以外没有别的办法。

一国两制构想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政策 50 年不变，也是从实际出发提出来的。首先是从香港的实际出发的。港英当局和广大人民拥护和赞成一国两制构想，但又担心香港回归政策发生变化。针对香港有人担心变这个实际，为了稳定香港人心，以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我们一再重申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政策长期不变。同时，对香港的政策我们承诺了 1997 年以后 50 年不变，也是从中国大陆的实际出发的，它不只是为了安定香港的人心，而是考虑到香港的繁荣和稳定同中国的发展战略有着密切的关联。中国大陆制订了一个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国民生产总值比 1980 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 2000 年再翻一番，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需要几十年的时间来实现这个“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目标，一要政局稳定，二要政策稳定。稳定就是不变，我们怎么会去“变”呢？而且，一国两制的方针和政策 50 年不变，也是从世界实际出发的。当今的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各国间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越来越密切。我们对香港和澳门、台湾的政策是开放政策的组成部分。我们不仅可以从这些地区学习先进科学技术和管理经验，引进资金和人才，还可以通过这些地区加强同世界各国的

联系。这样，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

事实已经证明，香港得以回归，一国两制构想得以实现，用邓小平的话来说，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

(二)历史辩证法的见证

落后就要挨打、挨宰割，国力强盛才能统一。这是历史的教训，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一个多世纪以前，由于晚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家落后，英帝国主义借着船坚炮利，逼迫晚清政府签订城下之盟，强占了整个香港地区，中华民族由此蒙受了丧权辱国的奇耻大辱。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军屡战屡败，不仅海上不能打，陆上同样不可恃，事实证明清政府确实已经没有能力捍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政府和人民继续为收回香港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国民政府曾多次要求列强废除租界和租借地，并为收回九龙租借地作了一些努力。在蒋介石手上，两次丧失收复香港的良机。百余年来，我国收复香港经历了漫长而艰苦的历程，但都以失败而告终。究其原因，有多种多样。但归根到底有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国家落后，缺乏实力作后盾。

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城楼上响起一个伟大的声音：“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从此宣告了中国半殖民地时代的终结。但香港回归问题，也是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到80年代才提上议事日程的。在中英谈判之初，开始撒切尔夫人只同意谈新界问题，不同意谈香港、九龙问题。到1984年，中英谈判为什么能够取得成功呢？因为我们国家经过改革开放和集中精力进行现代建设，经济发展了，有实力了。邓小平说：“并不是我们参加谈判的人有特殊的本领，主要是我们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英国不能象对待阿根廷那样对待中国。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里也说：香港谈判不是也不可

能是英国的胜利,因为我们同对手相比力量悬殊,对手又不肯妥协让步。

今天,香港已经回归,澳门也即将回归,台湾回归只是时间问题。但是,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不断提高我们的综合国力,这是实现国家统一大业的基础和前提。邓小平当年在谈到 80 年代三件大事时,曾经告诫我们: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加紧经济建设这三件事的核心是经济建设,这是我们解决国际问题、国内问题的最主要的条件。一切决定于我们自己的事情干得好不好。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的大小,要看我们自己经济建设成就的大小。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大。现在我们在国际事务中起的作用并不小,但是,如果我们的物质基础、物质力量强大起来,起的作用就会更大。台湾回归祖国、祖国统一的实现,归根到底还是要我们把自己的事情搞好。我们政治上和经济制度上比台湾优越,经济发展上也要比台湾有一定程度的优越,没有这一点不行。四个现代化搞好了,经济发展了,我们实现统一的力量就不同了。所以,在国际事务中反对霸权主义,台湾回归祖国、实现祖国统一,归根到底,都要求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好。当然,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搞好,但是主要是必须把经济建设搞好。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吸引力、向心力、凝聚力的增强,归根到底都取决于生产力的发展。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100 年不动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 100 年不动摇,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搞好经济建设,增强综合国力,这是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

(三)“一国”与“两制”的统一

“一国”是实现“两制”的前提,国家主权不统一,“两制”无从谈起。“两制”是实现“一国”的手段,目的是通过适合的方式和办法实现祖国统一。一国两制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一国”和“两制”不能割裂

开来，不能将任何一方推崇为绝对，搞片面性。

首先是“一个国家”，国家主权是第一位的问题，实行一国两制，归根结底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在国家主权问题上不能作任何让步，不能拿原则作交易。1982年9月，邓小平同撒切尔夫人第一次会谈时，就旗帜鲜明地表明了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指出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式和办法。如果中国在1997年，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8年后还不能把香港收回，任何一个中国领导人和政府都不能向中国人民交代，甚至也不能向世界人民交代。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信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有人用“发生严重的波动”、“带来灾难性的影响”来威协，企图动摇我们维护领土完整和实现祖国统一的决心。但这是徒劳的。邓小平作为伟大的爱国者和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子，用斩钉截铁的语言，表明了在主权问题上毫不退让、毫不妥协的坚定态度。他对撒切尔夫人说：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象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这种在主权和领土完整问题上寸步不让的坚定态度，迫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按照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来进行谈判，并最终达成协议。

为了体现“一国”，体现国家主权的完整性和统一性，我们坚持“中央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具体事务”的同时，坚持中央的某些权力。香港特别行政区是一个直辖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

的地方行政区域。“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全国人大依据宪法制定的、属于国家的基本法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来源于国家授权，其防务和有关的外交事务由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中央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还行使行政长官和政府主要官员的任命权。立法会对行政长官的弹劾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是否有效。在国家宣布战争状态或者在香港发生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时，全国人大常委会有权决定香港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以颁布命令，将有关的全国性法律在香港实施。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那就不叫“一国”了，就没有国家主权的完整性、统一性了。

同时，我们又十分明确地规定，特别行政区不同于内地的省、市、自治区，其“特别”之处在于实行一国两制，并因此享有其他地方行政区所不具有的高度自治权。按照香港基本法的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除外交和国防事务属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以外，其余均自行管理。有行政管理权、立法权、独立的司法权和终审权，即所谓“四权”。香港将保持“自由港”的地位，保持财政独立地位（中央不征税），保持独立关税区地位，保持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即所谓“四保持”。此外，香港特别行政区还保有一定外事权，可用“中国香港”名义进行若干活动。一句话，香港特别行政区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总之，“两制”是“一国”中的两制，不能因为实行两制就忘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主权的完整，不能因为“高度自治”就认为“中央一点都不能管”。同时，“一国”是实行两制的一国，不是“一国一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10亿人口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将“一国”和“两制”统一起来，不搞任何形式的片面性，这就是“一国”和“两制”的辩证法。

（四）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

《矛盾论》告诉我们：“矛盾着两方面中，必有一方面是主要的，他方面的次要的。其主要的方面即所谓矛盾起主导作用的方面。”“事物

的性质主要地是由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所规定的。取得支配地位的矛盾的主要方面起了变化，事物的性质也就会随着起变化。”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并存，不是平起平坐，而是以社会主义为主体。主体就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资本主义国家，这个性质是由主体即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的。邓小平在论述一国两制的问题时，十分注意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十分强调“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他指出：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但允许国内某些区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比如香港、台湾。大陆开放一些城市，允许一些外资进入，这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有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比如外资到上海去，当然不是整个上海都实行资本主义制度。深圳也不是，还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的主体是社会主义。”

为什么说一国两制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呢？首先，一国两制构想的提出，是立足于社会主义制度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一国两制的基础，没有社会主义制度，就没有一国两制的构想。邓小平说：我们对香港、澳门、台湾的政策，也是在国家主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没有中国共产党，没有中国的社会主义，谁能够制定这样的政策？我们搞的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所以才制定一国两制的政策，才可以允许两种制度存在。

其次，一国两制构想的实行，以保证大陆 10 亿人口的主体是社会主义为前提。邓小平说：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10 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 10 亿人口，台湾是近 2000 万，香港是 550 万，这就有个 10 亿同 2000 万和 550 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 10 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允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我们相信，在小范围内允许资本主义存在，更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我们对外开放 20 来个城市，这也是在社会主义经济是主体这个前提下

进行的，不会改变它们的社会主义性质。相反地，对外开放有利于壮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

中国的主体必须是社会主义，没有这个前提，社会主义就有被资本主义吃掉的可能，国家的性质就有由社会主义变为资本主义的可能。所以，在实行一国两制的过程中，坚持社会主义的主体地位，抓住这个决定事物性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我们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旗帜不动摇，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统一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过程。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和完善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经济成分和分配方式为补充的原则。在继续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同经济、政治的改革和发展相适应，在切实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过程中，一定要坚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目标。中国的主体、10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这个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了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社会主义性质是不可撼动的。

（五）变与不变的辩证法

1987年4月16日，邓小平会见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谈到“50年不变”的问题，即香港1997回归祖国以后50年政策不变。谈话中，他批评有的人思想方法带有片面性，想问题只想一面，没有想到另一面，缺乏辩证的思维。他除了讲香港回归以后，香港的地位不变，对香港的政策不变以外，接着说，还要讲一个不变。大家对于中国党和中国政府坚持开放政策不变，很高兴，但是一看到风吹草动，一看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说是不是在变了。他们忽略了中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两个方面，说不变不是一个方面不变，而是两个方面不变。人们忽略的一个方面，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

社会主义制度，坚持共产党领导。人们只是说中国的开放政策是不是变了，但从来不提社会主义制度是不是变了，这也是不变的嘛！

讲两个方面“不变”，不是讲一个方面“不变”，反映了唯物辩证法“两点论”的要求，表现了一国两制的内在要求。一国两制，一方面是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 50 年不变，具体表现在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不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与外国的经济关系不变。另一方面是大陆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永远不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100 年不动摇。老实说，如果没有这个不变，如果不坚持在共产党领导下大陆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要保持香港 50 年繁荣和稳定，50 年以后也繁荣和稳定，是根本不可能的。两个不变之间，彼此互为条件，互相促进。坚持大陆主体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变，可以保证和促进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香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长期不变，保持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大陆主体可以利用资本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有利于巩固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

关于变与不变的问题，1984 年 10 月 3 日，邓小平会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谈话中指出：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都拥护，谁要变人民就会反对。接着邓小平从思想方法的高度，具体分析了变与不变对于内地和香港的利害关系。笼统地说不变就好，变就不好；或者说，变就好，不变就不好，都是不对的，都不符合辩证法。事物的稳定性、不变性总是相对的，而它的不稳定性、变动性则是绝对的。事物总是变中有不变，不变中有变。关键在于要具体分析什么东西在变与不变，变与不变的性质是什么，朝什么方向变，变与不变对具体事物带来的具体利害关系是什么。邓小平说得非常好：“再说变也并不都是坏事，有的变是好事，问题是变什么。中国收回香港不就是一种变吗？所以不要笼统地说怕变。如果有什变，一定要变得更好，更有利于香港的繁荣和发展，而不会损害香港人的利益。这种变是值得大家欢迎的。如果说什么都不变，你们不要相信。我们总不能讲香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所有方式都

是完美无缺的吧？即使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之间相互比较起来也各有优缺点。把香港引导到更健康的方面，不也是变吗？向这样的方面发展变化，香港人是会欢迎的，香港人自己会要求变，这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也在变。最大的不变是社会主义制度不变，而一国两制就是大变，农村政策就是大变。……问题是变好还是变坏。不要拒绝变，拒绝变化就不能进步。这是个思想方法问题。”我们认真领会邓小平阐述的这个思想方法问题，掌握好变与不变的辩证法，对于我们落实一国两制的构想，促进回归后的香港和大陆主体的繁荣和发展，意义十分重大。

（一九九七年六月二十日）

高举伟大旗帜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湖南省哲学学会理事长

刘普生教授在 97 哲学年会上的讲话

(根据纪录整理)

江泽民总书记 1997 年 5 月 29 日在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上指出,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 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 一定要高举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伟大旗帜, 用这个理论来指导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江总书记的重要讲话, 是我们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 把我们的事业胜利地推向 21 世纪的政治宣言, 是具有极其重大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纲领性文件, 值得我们哲学理论工作者深入学习和认真领会。

(一)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一个旗帜问题。江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强调, 旗帜问题至关重要。旗帜就是方向, 旗帜就是形象。这里讲的旗帜问题, 是就我们的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而言的。那么, 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是不是也有一个旗帜问题呢?乍看起来,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 因为当我们讲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时, 就意味着同时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旗帜, 没有必要另提旗帜问题。但是, 当我们真正给自己提出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任务时, 就意味着不能让马克思主义哲学停留在过去的水平上, 而是要使之获得新的科学内容和新的表达方式, 达到新的理论境界, 这里就有一个坚持什么发展方向, 塑造什么形象的问题。邓小平理论科学地把握了当代中国的时代特征及发展趋势, 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当然也包括当代中国马克思

主义的哲学理论),理所当然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这不仅不与高举马克思主义哲学旗帜相违背,而且是真正地高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帜,真正地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当代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性任务,就是要使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当代化、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和发展,一方面,有一个从民族哲学向世界哲学转变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于德国,固然具有强烈的民族特色,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和普遍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39页),每一个民族的生产都“同整个世界的生产(也包括精神生产)发生实际联系,并且可能有力量来利用全球的这种全面生产。”(同上书第42页)于是“哲学对于其他的一定体系来说,不再是一定的体系,而正在变成世界的一般哲学,即变成当代世界的哲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1页)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时代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世界哲学。另一方面,作为世界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又必然要同各民族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研究本国的新情况、新问题,马克思主义哲学才能得到发展。列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俄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分析了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以后,世界政治、经济的新情况,把马克思主义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从而也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然也包括毛泽东哲学思想)。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邓小平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在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也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进一步中国化、当代化开拓了新的理论境界。

有一种意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必然出现二难困境。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100多年以前诞生的,具有德国民族特色的民族哲学,不中国化、当代化,则不符合中国的实际,不能指导中国的实践。但如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和当代化,又由于中国传统文